第一章　港深经济一体化是港深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了缓解香港在其未来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制约因素，诸如土地严重不足、高地价降低了香港的竞争力；香港经济腹地太小，限制了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发展高科技产业面临许多困难等等。香港在其未来经济发展中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同内地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同深圳之间的经济关系。香港同深圳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将有可能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香港回归则为这种一体化发展趋势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本书将从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香港同内地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是探讨香港同深圳经济一体化的问题。

一、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有助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将经济活动的重心和方向从原来的面向内地，转为面向沿海和国际经济时，曾面临着因长期封闭而缺乏与国际经济进行合作交流的有效通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过去 20 余年来，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和桥梁，香港充分发挥了它作为亚太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的功能，协助开放的中国迅速重返国际经济社会，在此过程中，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内地和香港相互之间早就成为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其中，香港与华南地区更形成一种彼此日益相互依赖和融合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关系，由此形成的新的发展力量，使这一地区正成为未来中国和亚太地区最具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新的经济区域之一。

但是，在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的发展为两地带来互补互惠、协同发展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问题。这就是因内地经济与香港经济在规模、体制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当双方的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逐渐加深时，规模较小的香港经济可能受到与内地有关的某种过大的需求的影响，而在发展和结构上出现某种失衡。 20世纪 80年代后期至 9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结构急剧变化，劳动力大量短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些现象，作为经济发展失衡的一种表现，很大程度上就与内地因素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有关。

香港经济是高度开放的经济，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内，在经济结构上出现某些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鉴于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于香港经济的影响和重要性日益突出，因而，研究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对于香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成为当前研究香港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以及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长远目标和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一）加速提高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层次

香港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内迁，在 20 世纪 80年代对两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两地的这种合作本质上还是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短线的互补合作，属于低层次的。这种合作形式不利于两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由这种简单的互补性的合作，上升到一种新的高层次的合作，是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已获得了多方人士的共识。

目前内地与香港“前店后坊”的分工格局如何进一步提高和升级，难以用行政方法或在政策上硬性调整使合作层次提高、升级，只能循序渐进，从政策上加以引导。应继续鼓励港商到内地投资，但投资范围与项目应严格选择。应增加吸收技术含量较高及产品出口受西方国家限制少的工业投资，减少乃至限制原料使用密集、污染性大、出口受西方严格控制的工业投资。重点应放在鼓励投资兴办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发展目前最迫切需要和对今后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原材料、元器件工业，包括电子元器件、三大合成材料、化工原料和有色金属、五金材料等，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发展高科技产业。政策上要更加优惠，包括合作年限、所得税减免、融资担保、市场保障、海关税率等等，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使制造业在技术结构上朝着高度化升级。

内地与香港应进一步加强科技领域的合作。积极发展内地与香港科技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无疑是现在推动两地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种必然趋势。过去两地科技合作关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两地投资、贸易关系的发展。合作的范围很狭小，主要集中在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方面。其中的原因既有两地工商界、科技界在科技方面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不足、对内地科技人员访问香港及在港合作控制过严，也有港商侧重于短期合作利益，不愿进行长期的、风险较大的合作。

从目前情况来看，发挥内地雄厚的科技研究和开发力量，利用香港灵敏的信息、技术引进开发环境、市场营销的经验、良好的融资能力以及各种优良服务等条件，通过香港有重点地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并把内地的科技成果有计划地转化为商品，采取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联合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如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开发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实行设计、开发、研制、生产、销售一条龙。这一方向的合作趋势，将促使两地经济关系朝更高层次发展，并为香港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和提高内地利用外资的层次起强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内地来讲，要充分利用“巴统”对香港给予的高科技产品进口和转口方面的优惠待遇的时机，透过香港引进国际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针对国际市场需求，迅速消化和创新。

总之，两地经济合作关系会不断向高层次的新格局推进。1997 年 7 月 1 日以后，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根据两地的共同经济利益，已经形成更紧密、更全面的合作新局面。因为原来制约两地经济合作关系向高层次发展的政治、外交等因素已经消失，至于经济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则可通过直接磋商来协调，合作中出现的阻力和矛盾，将较易得到缓和或消除。不难预见，两地从共同利益出发，将形成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合力，既对保持香港长期的繁荣和稳定起到促进作用，对中国对外开放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内地与香港经济的多层面合作

内地和香港在经济上的合作可以说是多层面的。

1．第三产业是目前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重点。香港第三产业发达，在内地与香港合作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1）金融合作前景广阔

香港拥有高度密集的金融机构、各类市场齐全（资金、外汇、黄金、股票、期货市场），管理手段先进完善，加上自由港的特殊有利条件，资金、

外汇进出自由，因而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资金。既满足了本地贸易和投资的需要，又为内地融资提供了方便。加强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要扩大两地融资渠道、放宽政策，大胆引进外资银行到沿海地区、特区或重点大中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根据 WTO 原则适当放宽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选择若干大中型企业作为股份制试点，到香港发行债券或股票，扩大 H 股发行量；借鉴香港金融市场的管理经验和运作机制，加快内地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发展，扩大上海、深圳证券市场的覆盖面，逐步使之与香港证券市场联网。

（2）房地产业合作方兴未艾

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也是港府的重要财源，其兴衰对香港金融业和股票市场均有较大影响。内地的房地产业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兴起，房地产市场尚不发达。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内地房地产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香港房地产商也大举进军内地，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掀起了成片土地开发的“开发区热”、工业厂房、住宅、商业楼宇等投资热潮。这股房地产热有利于加快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发育，但必须加以引导和管理，以防止“过热”和大量土地、特别是耕地的撂荒。加强内地与香港房地产业合作要突出重点，一是老城区住宅、商业楼宇的建设和改造；二是要用于基础设施如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的建设和改造；三是新兴工业区的开发与建设；四是旅游景点的建设及旅游服务设施的改造；五是双方合作进军中东、东南亚等地的房地产市场，以促进双方房地产业的共同发展。

（3）能源、供水、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合作将开创新局面

广东与香港在能源（主要是电力）、供水、交通通讯方面早已有较多的合作。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批香港大财团更是积极参与内地基础性大项目的建设和开发。投资多、规模大、范围广，合作形势喜人。如香港北海、新鸿基财团共同出资 60 亿港元兴建黄田至元朗的轻铁工程；合和实业集团斥巨资兴建沙角 B 厂、C 厂；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与上海港务局合资建货柜码头，改造上海港等。这将进一步完善内地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

（4）旅游业合作迈上新台阶

香港是世界旅游中心，有“购物天堂”之美誉。拥有先进完善的服务设

施和高质量的服务。但香港毕竟乃弹丸之地，旅游资源不足。而内地幅员辽阔，风景名胜多，历史文化古迹多，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双方合作，共同开发建设旅游景点，共同组织客源，建设旅游服务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推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必将对游客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第三产业的范围很广，除以上重点行业外，两地在信息业、劳务输出、工程承包、商业零售、百货业等方面的合作都有待加强和开拓。

2. 加强第一产业合作，促进内地“三高”农业的发展，并为香港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农业产品。

3. 加快双向发展，在港资深入内地发展的同时，中资也要在港谋求更大发展，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两地合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也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措施。

（三）中资机构对维护香港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地在香港的投资规模及发展战略，对于能否充分利用好香港，并促进香港经济繁荣稳定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在港投资有较快增长，据 2004 年统计总额超过 1238 亿港元，开设公司约 2400 家，在香港各类资本中，成为香港最大的投资者。中资在港投资的主要特点：一是对香港公用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参与。中信（香港）斥资 100 亿港元从英国大东电报局手上购买二成香港电讯股份，成为香港电讯的第二大股东，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宗的股权收购；还动用 1 亿元增购港龙航空公司股权，成为它的最大股东；中信（香港）还持有了国泰航空公司的 12.5％股权以及东区海隧 23.8％的股权；华润集团持有大老山隧道 24％股权及国际货柜码头 10％股权，中资在香港公用事业的投资主要是在香港的集资。二是对 31 家香港上市公司已取得控制权，涉及工业、银行及地产行业。三是对房地产投资总额超过 1000 亿元，其经营转以中长线投资为主。四是对工业的投资超过 150 亿港元，约占香港制造业外来投资的三成。

驻港中资机构在香港金融、贸易、运输、旅游等行业中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为维护香港金融体制和市场稳定，促进香港贸易、航运、旅游、工程建设的发展，推动工业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香港经济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虽说中资在香港已有一定基础，但还不够强大。因此，中资仍要进一步壮大实力，在政治上无不良影响、经济效益好的情况下，也可考虑采取与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资本结合进行一些项目投资，开展多元化经营。总之，中资市场在香港应不断发展自身业务，并参与管理，以争取对香港经济事务方面的发言权。比如，香港中小住宅楼宇地产市场被不到 10 个发展商高度垄断，对特区政府、金融界和整个香港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而且经过连续多年房地产升值后其资金实力相当雄厚，控制市场的技巧也非常熟练。对此，香港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资应奋起打破地产垄断局面，中资亦应该有专门从事地产业务的地产公司，中资公司凭着相互之间业务上的配套，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只要有足够的协调、配合，应该有能力抑制香港地产市场垄断程度，阻遏垄断趋势。

在这里需要顺便强调一下，香港经济的国际性问题。国际性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大优势之一，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香港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这是战后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看，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香港经济的国际性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发展。因此，中资在香港的发展，无论在发展规模上还是在投入的行业结构上，都应以维护香港经济的国际性及其自由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为前提，既反对别人垄断，也不能自己搞垄断。

二、深圳和香港均处于一个特别发展时期

深圳目前正处于一个特别发展时期。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工商业大城市，一个外国记者如是说，要了解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首先必须要了解深圳。深圳是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缩影，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官”和“试验场”，深圳人创造的“深圳速度”，使深圳变成被世人惊叹为“一夜之间兴起的大都会”。

深圳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成立经济特区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及衔接一国两制的“缓冲区”，它既是集中引进外资和海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基地，又是连接国际市场与内地广阔市场的最便捷的枢纽站。这对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深圳特区成立后，就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积极推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深圳特区最先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让

外资企业可以自由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主决定其生产经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深圳又开始价格改革，先是实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方针，后又转至“以放为主”，至20世纪80年代末，91%以上的商品价格已由市场调节，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定价商品所占比重已达95%以上。目前，深圳市场几乎全部放开。1986年，深圳又率先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推行企业产权转让，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发行股票、债券并上市交易，开设证券市场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深圳又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新探索：

1. 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三个层次，实现三个分离

在上层，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办公室，其职责是全权检查、监督深圳特区经营性、资源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经营运作，以实现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分离；在中层，成立经营性的市级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具体负责全市国有资产产权的经营，以实现政府对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与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营相分离；在下层，授予国有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对国有资产依法生产经营，以实现国家的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相分离。

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总结，深圳市建立并完善了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如产权代表报告制度，财务总监制度，监事报告制度，利润分类上缴制度，公司、法人和专项审计制度，经营业绩考核制度，资产基础管理制度和监管制度等。在此基础上，又在继续探索以国际招标方式进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在权利、责任和义务相统一原则指导下，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授权经营试点。首批5家公司试点于2003年完成，它们拥有重大决策权、人事管理权、投资收益权和资产处置权，并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一俟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将会大面积铺开。

2. 通过立法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

深圳从1992年7月1日获得立法权到1995年底的3年多时间里，在规范市场主体，培育要素市场发展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58项法规，对原来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

面清理，这是深圳立法的高潮期，初步建立了一个法规体系，将社会、经济和生活等方面纳入了法治的轨道。进入新世纪后，为了积极主动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和市场经济往纵深发展的需要，深圳加强了立法工作，仅在2003年，深圳共完成起草、审查法规草案和规章21件。深圳正充分利用立法权，重点推进“9个法定化”，即在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行政程序，行政审批，行政收费，行政处罚，政府招标采购，政府投资行为，行政执法责任和政府内部管理等九个方面，明确每一个方面法定的具体目标和实施步骤，力求使政府行政受到全面、具体、严格的约束。 2003年，深圳市委被评为“依法治省先进单位”，这是深圳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个亮点，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主持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把深圳的城市发展潜力排在内地城市的首位，主持报告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院士说，过去深圳的发展动力源于经济制度的创新，未来深圳的发展将依托于政府治理制度的创新。

3. 努力探索现代企业制度的新路子

1993年1月，深圳制定了《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条例》，5月制定了《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分类定级实施方案》， 6月又颁布了《取消企业中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意见》，这4个文件的颁布为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进入新世纪后，深圳加大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力度。 2001年1月，深圳市政府颁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及其附件（简称“1+11”文件）。2002年又就进一步深化市属国企改革进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重点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以国有企业、公共事业领域，社会中介领域的国际招标招募改革为突破口，并选择能源集团、水务集团等企业为试点，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体制；二是大力推进产权主体多元化，从根本上解决国有独资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三是在对重点国有企业实行授权经营试点的基础上，促进上市公司重组，优化产权结构，全面推动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四是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创新政府监管模式，不断提高企业经营水平和政府宏观管理水平。

4. 转化政府职能

深圳前后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全面推进公务员制度。同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能主要转变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以保证经济健

康、快速发展。 2002年，中央在深圳进行的“深化公共行政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展开，深圳从国情和实际出发，积极吸收国内外公共行政研究的最新成果，合理借鉴境外、国外的先进经验，遵循“以人为本”、“服务为本”、“效绩为本”的原则，对传统行政管理进行突破与创新：一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二是政府政策的公共化倾向，三是公共事务的社会化委托，四是绩效目标与顾客服务导向。从而对转变职能、调整事权、依法行政、审批制度、组织人事、公共财政、电子政务、公共服务社会化、事业单位改革、非政府组织培育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较为全面的改革与创新。其目的是循序实现“五大转变”，一是从传统行政文化到现代行政文化的转变，二是由“人治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转变，三是由“硬性体制”到“弹性体制”的转变，四是由“大政府”到“小政府”的转变，五是由“权威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

5.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993年，深圳成立了医疗保险局和社会保险局，离退休保障、待业保障、医疗保险和住房基金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社会保障体系开始逐步发育和完善。后来，深圳市将医疗保险局并入社会保险局。进入新世纪后，深圳的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一是建立了城市化人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并于2003年11月1日实施，城市化人员养老保险制度一步到位与企业员工养老保险相衔接，确保了城市化人员的基本生活，有效配合和促进了全市城市化进程，这是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二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2003年7月1日实施的《深圳市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办法》提出了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地方补充医疗保险、生育医疗保险等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大大提高了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有效解决了因病致贫的问题。这是深圳市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1年来经验的升华和结晶。三是积极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积极做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工作。四是成立社会保险个人服务中心，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深圳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2003年，深圳五大经济指标突破“1000”，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总产值(现价)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0.36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173.99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达到1065万标箱，跃居全球集装箱枢纽港第四位；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1000万人次，达到1084万人次；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工业、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全面迈上新台阶，为深圳提出的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3年，深圳完成GDP2860.51亿元，比2002年增长17.3%；2004年又实现了3000亿元的跨越，GDP达到3422.8亿元，又比上年增长17.3%。

深圳的迅速崛起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对内地起到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同时深圳也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支持内地经济发展，据有关统计表明，深圳对内地的投资已高达640亿元。许多资金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大举进军内地，不仅带去了巨额资金和先进技术，而且带去了新的企业精神、现代企业制度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此外，深圳还向内地转移国外先进技术，为内地牵线搭桥引进外资，并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为内地培养经营管理人才、技术熟练工人。

但是也应当看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1990年春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1992年秋天，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三个中心”。于是，占地500多平方公里的浦东——东上海的开发开放，立即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位外国资深记者感慨地说，“就像了解80年代的中国首先要了解深圳一样，要知道90年代的中国，必须先读懂浦东。”上海随着浦东的开发及优惠政策扶持，开始再振雄风，夺回中国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上海的重新崛起，吸引了国内外巨额资金和优秀人才。深圳80年代那种马太效应下的资金洼地和全国各地精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深圳“淘金”的局面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深圳各类生产要素成本大大提高而产业结构却未能发生根本变化，这是深圳当前面临严峻考验的最根本原因。深圳劳动力成本日益高昂，房地产价格暴涨，导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产品竞争能力不断下降，1995年后，过去一直盈利的零售业出现全行业亏损便是明证；物价居高不下，如深圳许多商品和服务费用与毗邻的香港相比已相差无几，香港人普遍认为深圳的各项消费已不再便宜。深圳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使需要低廉劳动力和房地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迫大举内迁。而深圳市企业登记注册手续日益烦琐、严格，往往一个新企业的登记、注册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奔波，使外商日益对深圳丧失信心，他们开始舍近求远，到政策更优惠、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更为低廉的内

地寻找良好的投资场所。

深圳目前的处境可以说是夹缝中求生存，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政策优势逐渐丧失，毗邻地区及中国重要城市，特别是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特区作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已经丧失殆尽；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使深圳由资金净流进区变成资金净流出区，这使得深圳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深圳将如何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呢？

香港与深圳一样目前也处于特别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香港必须顺利完成三个“转型”：一是香港的政治转型，即香港的宪法必须由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过渡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上来。香港回归后实现“港人治港”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加以保障，这就是《基本法》，回归后香港就要依照《基本法》来规范自己的政治、经济以及一切活动；二是香港的经济转型。虽然香港已步入富裕社会的行列，但香港经济仍未完全脱离发展中经济的痕迹。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香港经济与社会进入战后第五个发展阶段，即由“新兴工业化经济”向成熟的“发达经济”转型的阶段，在过渡时期如何加快其转型和保留转型后的发展后劲是至关重要的；三是港人的心理转型，即由习惯于英国统治 150余年的生活逐步转型到以《基本法》为依据的“港人治港”的生活去，这需要进一步加强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感，树立起后过渡时期留港、建港的信心，为香港的稳定、繁荣与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香港在回归后不久就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及经济持续低迷，香港经济面临空前的挑战。

对香港而言，不管是 80 年代还是 90 年代，或者是回归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实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互相冲突、相互排斥的，虽然采取井水不犯河水的办法可以和平共处，友好竞争，共同发展，但两种不同制度的冲突、磨合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内耗。因此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合作需要一个缓冲区和试验区。而毗邻香港，与香港交通便利的深圳最适合承担这个角色。

三、港深经济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港深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目前阶段主要是港深经济达到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互衔接。港深经济衔接对于港深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港深经济衔接对香港方面来说，在回归前是为了实现香港经济的平稳过渡，在回归后是为了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保证香港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对深圳方面来说，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双重历史任务，一方面作为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窗口”，担负着对内地经济改革的示范、辐射和带头作用，并希望通过香港巨大的辐射力，促进深圳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形成以港深穗为中心，以泛珠江三角洲为腹地的经济圈；另一方面，作为实现“一国两制”构想的前沿阵地，通过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的衔接建立“一国两制”下的缓冲区，减少两种不同制度的相互冲击和碰撞。

目前是港深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时期，港深经济一体化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

深圳和香港在 20 世纪 90 年代遇到的巨大挑战以及两地经济的互补性为港深经济衔接提供了条件和坚实基础。“九七”后，香港回归祖国，除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外，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日益紧密，港深经济互补的优势就会凸现出来。香港劳动力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高昂，科技力量薄弱，而这些相对来说恰好是深圳的优势，而深圳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及国际市场是香港的强项。目前港深在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信息等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但港深两地的科技合作更是当务之急，港深两地共同面临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问题，香港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缺乏足够的人才和足够的技术含量，这可以通过深圳的科技能力与香港的应用技术开发能力相结合，并积极谋求与内地加强科技开发和应用的合作加以解决。引进外国技术成本昂贵，而内地不仅科研成果众多，而且价廉物美，内地拥有数以千万的科技人才，其中不乏高科技人才，拥有较强的科技优势。但内地的科技实力受到资金条件的严重制约，科技成果商品化、实用化及高科技产业化的能力较差，而香港恰恰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如果港深与内地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有效的合作，便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港深可以利用内地的科技力量达到提高传统行业技术含量，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并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利用高科技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港深经济一体化，大大增强了双方的实力，从而使港深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泛珠江三角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力，有可能形成以港深穗为中心，以泛珠江三角地区为腹地的庞大经济圈。香港的管理经验、知识技能、客户关系及

资金与泛珠江三角地区充裕的土地资源，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发达的科技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将使泛珠江三角地区优厚的工业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并向商业化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泛珠江三角地区的崛起，将成为亚洲第五条小龙。这种世界级经济区域的形成，不仅给各方带来互补互利的经济效益，同时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牵引力，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地迅速发展。

第二章“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及港深承担的角色

一、建立中国统一市场的模式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四个地区经济都呈飞速发展的势头而又各具特色，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及澳门能否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合作来加快各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一直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香港浸会学院社会系首席讲师黄枝连先生在1980年发表的《美国203年：对“美国体系”的历史学和未来学的分析》一书中正式提出“中国人共同体”或“中国人经济集团”的概念。这是诸如“中国经济圈”一类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讨论之滥觞。从此，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构想，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程度各异，但大多数学者主张的是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这个中国区的经济合作。由于澳门地狭人少，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甚小，故在此不予论述。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的经济联合起来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经济实体。如以当地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计算。2004年，中国内地的GDP约为1.65万亿美元，台湾约3000亿美元，香港约1700亿美元，三地合计约为2.1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在两岸三方中，港台两地人口约3000万，仅占全中国人口的2.3%，而GDP却占到三地总额的22%以上，这表明中国内地与台、港间存在巨大差距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内地经济实力迅速膨胀，现在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不亚于美国。2004年，中国内

地的外汇储备超过 6000亿美元，比欧洲国家的总和还多，仅次于日本。如果加上台、港的巨额外汇储备，则超过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 8000 多亿美元。同年，中国内地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连续几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又激增 35.7% ，达到 1.15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德，居世界第三位。如果加上台、港的对外贸易总额则超过 2 万美元，远远超过德国，几乎能与世界上的最大贸易国美国并驾齐驱。贸易总额的大小体现出一个国家市场容量的大小。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容量急剧扩大。一个 13 亿多人口的中国统一市场，是足以与欧盟，北美经济圈等任何一个区域市场相抗衡的。三地之间的相互贸易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彼此的贸易依存度相当高。这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尤为突出。 1994 年，中国内地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为 46.3%. 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贸易依存度为 39.3%。虽然近十年来中国内地极大地拓展了欧盟、日本及美国市场，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大为降低，但随着 2004 年 CEPA 的实施，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的联系更趋紧密。 2003 年，中国内地和台湾的贸易总额突破了 700 亿美元，彼此间的贸易依存度都在 10%左右。贸易依存度较高对建立中国统一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的经济存在着很大互补性。中国内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并且拥有相对强大的科技力量及广阔的市场；而台湾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比较发达的制造业、研发力量、先进技术和高质量的劳动力；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之一，作为金融中心，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筹措到巨额资金，作为贸易中心和服务中心，可以凭借遍及世界的销售网络及高质量的服务，敏捷、快速地开拓和扩大国际贸易市场。

讨论中国四方采取何种模式来推进经济合作及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是饶有兴趣的。中国四方的经济一体化既不同于东西德的经济一体化，也不同于独联体内部各国的经济一体化。东西德是先统一，然后再实行经济一体化。而独联体内部各国则是在“统一”解体之后而代之以低层次的“一体化”。东西德的经济一体化是在同一民族中进行的，而独联体的一体化是在不同民族之间进行的。而中国的经济“一体化”是与“统一”同时进行的，而部分的“统一”完成于较高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之前。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和“政治障碍”。由于互补互利的要求，港、澳与珠江三角洲乃至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逐步朝经济一体化过渡，这是与“统一”

同时进行的。1997 年和 1999 年，港、澳已先后回归祖国。但遵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港澳仍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由于港、澳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以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台湾除与中国内地政治制度不同外，还存在着“政治障碍”，这决定了两岸经济合作目前只可能是有限的，其经济分工大体属于“国际分工”的范畴，那么中国四方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等同国际经济一体化。

国际经济一体化大体可归纳为五种形式：

（1）自由贸易区，即内部无关税；

（2）关税同盟，即在内部无关税的同时对外实行共同关税；

（3）共同市场，即生产资料可以自由流动；

（4）经济同盟，即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

（5）完全经济一体化，即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

建立经济同盟和实行完全经济一体化，目前显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建立共同市场有无可能？现在许多学者提出了“大中华共同市场”，“华人共同市场”等，顾名思义应该是建立“共同市场”的构思；“中国经济圈”、“华人经济圈”，观其名不甚明了，但观其意，同样相当于“共同市场”。但由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台经济上有极大的差异，建立“共同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可谓是困难重重。兼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不同，经济体制及经济运行机制无法和谐地兼容，更加大了建立共同市场的难度。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内地与港、澳有可能采取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两岸的经济关系也可能在比目前更高的水平上进行合作与交流。因此，把中国四方看作是“中华经济协作系统”为好。

由于广东 70％以上的对外贸易是与香港进行的，台商在中国内地的投资 50％以上集中在福建。粤港之间，闽台之间的经济已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了。从而形成了“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的雏形。而且一个涵盖两广、琼、闽、湘、赣、滇、川、港澳的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形成，再加上台湾，则更进一步扩展了“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的范围，如果能用 10 余年的时间通过华南地区的强大辐射力将其扩展到华中及华北，加快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及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整合。那么，最迟在 2020 年，便可大体完成中国两岸四方的经济统一，形成一个包涵整个中国的“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的大格局。

二、中国内地的区域经济整合

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是一个发展层次较低的发展中国家。2004年，人均GDP不过是1300美元左右，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十分之一。而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平稳，各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作为“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的主体部分中国内地面临的首要任务与台、港、澳不同，在加强两岸四方经济合作的同时还要加快中国内地内部各经济区域间的整合，以期形成统一的中国内地市场。

下面我们简要叙述一下中国内地目前的三大经济圈。

（一）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湾经济圈的提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有关。凭借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和世界初级制造业的大转移，珠江三角洲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以及台韩高端制造业的转移，长江三角洲也在90年代发展成为以上海为经济中心的大城市群。按照中国的发展思路，在未来的开放过程中，在中国的北部也需要经济支撑区域，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沈阳作为北方的重工业基地，加上天津和大连的地理优势使得环渤海经济圈得以建立。

最早的环渤海经济圈主要包括三省两市，即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后来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把山西和内蒙古也划入环渤海经济圈。但是，通常所说的环渤海湾经济圈范围只包括三省两市。尽管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失去优势，但环渤海湾经济圈还是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诸如天津、北京、大连、沈阳、青岛、济南都曾经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所以，在具体规划过程中，国家对环渤海湾经济圈的定位是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能源原材料的重要基地和外向型经济的复合基地。

（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

以上海为经济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这不仅因为上海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而且与上海浓厚的商业气氛有关。历史和人力资源是上海最宝贵的财富，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就是远东的金融和商业中心，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培养经济和商业人才的基地。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府的政策倾斜，珠江三角洲得到快速发展；此时长江三角洲虽然也在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